

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



黃山書社

主 編 耿 云 志

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

顧廷龍題



黃 山 書 社

(皖)新登字05號

責任編輯:趙國華

封面設計:郭寶林

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

耿雲志主編

黃山書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381號)

新華書店發行

揚州市邗江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1513·375

1994年12月第1版 199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200

ISBN 7—80535—717—X/K·387

定價:(全42冊) 26000.00圓

本書編號:3000115

編 印 說 明

本書收印的材料，全部采自胡適遺存在原北平寓邸的檔案原件，這批檔案包括三部分：文稿（包括日記）、書信和文件。本書輯印了前兩部分。

我們影印出版此書，目的在於為研究者提供原始資料，故一概不加注釋。謹說明以下各點：

一、文稿部分

（一）凡胡適未刊手稿，盡行收入。

（二）有的手稿與發表的文字一致，且久為大家所熟知者，不予收印。

（三）有些發表在很不易見的書刊上的文字，胡適自己保存下來，也酌予收印。

（四）有些胡適請助手代抄的文稿，原手稿已無存，未刊者，一概收入。有的雖發表過，但文字有出入，有的抄稿上還保存着胡適親筆改動的痕迹，或朋友簽注的意見，亦予收印。

（五）文稿略依水經注案，一般歷史考證，哲學史與文化史，文學與文學史，時論與雜文，講演，序跋，札記，其他文稿，日記等分類序列編排。但這種分類不能嚴格，比如有些記在一個小本子上的幾條性質不同的材料，只能按第一項內容性質，排入序列。

（六）文稿中有相當一部分未完稿或殘稿。一般都在目錄下注明。原無標題的文稿，一般由編者酌擬標題，在目錄上加※號以示區別。

（七）對於某些重要文稿的原來保存狀態，編者須加說明的，其說明文字均排在《目錄》該項之下。

二、書信部分

（一）來往書信是胡適檔案中數量最大。價值亦最高的部分。因其數量太大，難以盡行影印。我們選印的原則是：

（1）胡適本人的書信，全部收印。

②凡有相當影響的人物的書信，盡量收印。

③凡與胡適關係密切的親屬、朋友的信，盡量收印。

④凡書信中有實質內容，而非一般問候之信，無論何人，亦盡量選印。

(二)書信一律按人物編排，各人名下的書信，依時間先後編排，年月日失載的，為編排上的需要，由編者加以考訂，放在適當的位置。這些考訂文字均從略，一則限于篇幅，二則排印亦有技術上的不方便；三則，這些考訂未下十分工夫，沒有十分把握，讀者引用時，尚須自行認真加以考訂。

(三)書信部分的編排次序：

①胡適致他人書信，依受信人姓氏筆劃排列，致各受信人的信，依時間先後排列。

②胡適與其家屬間的通信，作為胡適書信的附錄，接排在胡適致他人書信之後。其順序是：

①胡適致母親的信；②胡適給江冬秀的信；③胡適給兒子的信；④胡適給其他親屬的信；⑤胡適母親給胡適的信；⑥胡適母親給江冬秀的信；⑦江冬秀給胡適的信；⑧胡適異母哥哥給胡適的信。

③他人給胡適的信，按信主姓氏筆劃排列，各信主的信，依時間先後排列。原信主附轉他人的信，仍附在原信之後。

④書信中有些是未完稿，有些有缺頁或殘損，或因水濕而字迹漫漶，均照拍，不另加說明。此外尚須說明：

(一)、遺稿及書信中均有一部分原為鉛筆或圓珠筆書寫的，還有的是寫在彩色信紙上面的，拍印效果不佳。這在目前，尚屬無法解決的技術問題。還有，因檔案原件均未曾裝裱，折痕皺裂之處不少，亦頗影響影印效果，讀者幸諒之。

(二)、本書在編輯和影印過程中容有疏漏、錯誤之處，尚祈讀者批評指正。

序

耿雲志

胡適是現代中國最具國際聲望的學者和社會活動家之一。生於一八九一年，安徽績溪人。十九歲赴美留學，是著名哲學家杜威的高足。一九一七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以倡導文學革命和思想解放運動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他在文學、史學、哲學等諸多學術領域都有開創性的貢獻，影響了一代青年學子。

胡適曾歷任中國公學校長，北京大學文學院長、校長，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董事、名譽秘書，抗戰期間，一度出任駐美大使。曾先後創辦或參與編輯《新青年》、《每周評論》、《努力周報》、《現代評論》、《新月》、《獨立評論》等刊物，在文化界、教育界、思想界均有重要影響。一九四九年離開大陸後，寓居美國。一九五八年起任臺灣中央研究院院長。一九六二年去世。

胡適生前，交游極廣，在著述、公事之暇，有細心保存書信、文件的習慣。一九四八年底離開北平時，在其寓所留下大量文稿、書信、日記及公私文件。這些資料一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精心保管。鑒於這些資料具有高度的史料價值，久為海內外學人所關注，我一直希望整理和刊布這些資料。但直至去年，才最終解決經費和出版辦法。根據近代史所之決定，由我主持對全部資料做了系統分類整理，並首先選輯影印這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書中所收胡適遺稿四百四十餘件，書信近六百通，其家屬和他人寫給胡適的書信五千四百餘通，其中最早的寫於一九〇八年夏，最晚的寫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這些都是胡適遺存的全部檔案資料中最有價值的部分。

第一部分是胡適遺稿，這里有大批極為珍貴的材料。胡適後半生絕大部分精力用於「水經注案」的考證，寫了數百萬字的文稿、筆記和抄錄備用的材料。其中有相當大一部分現存在臺灣胡適紀念館，該館所編印的《胡適手稿》共十集，前六集都是有關「水經注案」的材料。我們這裡影印的有關「水經注案」的稿子，有許多是

胡適治「水經注案」的早期的文稿，有些還保存得很完整。例如由王重民、劉修業代抄的長達二百四十六頁的《全校水經注辨偽》，這是胡適遺存的全部「水經注案」遺稿中最完整的一篇長文。此文寫成於一九四四年四月廿三日。作者有兩篇題記，第一篇用綠墨水寫於抄稿首頁末。文云：「我的水經注案諸文中，此為最早寫成的一篇，故最不滿我意。兩年之中，我收得的材料更多了，懂得的東西更多了，故此文必須重新寫過了。胡適卅五、六、十四」。隔了十天之後，作者又在目錄頁之後用紅墨水再題道：「此本是王有三先生和他夫人君寄女士代我鈔的。原稿本我已拆散重寫了。此本可以保存我在那個時期的第一篇重要文字的原來狀態。胡適，卅五、六、廿五」。這兩篇題記都是在自美歸國的太平洋洋船上寫的。

另一篇《全氏七校水經注辨偽》手稿一百三十餘頁，是由文字不相連屬的幾個部分組成的。仔細閱讀可以看出，這就是上引題記中所說，被拆散了的原稿。我們再看臺北胡適紀念館影印的《胡適手稿》第二集卷一《全氏七校水經注辨偽》一篇長稿，其中第一部分《全氏七校水經注》四十卷的作偽證據》之後，胡適題語云「卅五、六、廿四太平洋洋船上改寫卅三年的舊稿」，表明這部分稿子就是拆散了卅三年四月寫成的那篇長文之後重寫稿的一部分。而該書影印的《證明〈全校水經注〉的〈題辭〉是偽造的》，正是由王氏夫婦代抄的那部文稿中的另一部分改寫成的。

上述的例子使我們明白，把北京近代史所收藏的胡適水經注案遺稿與臺北胡適紀念館收藏的胡適水經注案遺稿互相參讀，可令人弄清胡適治水經注案的進程及其思想變遷的痕迹。

在一篇較早動筆而未完成的不連續的長稿（書中編者擬題：《胡適自述治水經注案的緣起及論述片斷》）中，作者提出「水經注案」的背後有理學與反理學的斗争的影響。他還強調，全、趙、戴三家治水經注皆有獨立的大貢獻，正如科學史上，差不多同時先後數人得到同樣的發現一樣，不應把這看成是互相偷竊。他引述美國學者湯姆斯女士所作《二人或二人以上同時獨立的發現與發明》的歷史年表，該表列舉了一百四十八種重要發現或發明都是差不多同時由二人或二人以上獨立作出的貢獻。這一點形成了胡適判斷水經注案的一個重要思想前提。

這部分遺稿中有關批評楊守敬、孟森判斷「水經注案」的錯誤的稿子（如《楊守敬審判全、趙、戴三家水經

注的錯誤》、《批評楊守敬審判水經注疑案的考證方法》、《駁楊守敬「趙戴未見朱箋原本」的妄說》及《孟森先生與趙戴兩家〈水經注〉等等》以及《總論一百年來許多學者審判水經注疑案的方法的大錯誤》，這些重要遺稿的影印出版，必能有助於了解胡適治水經注案考證的基本動機和基本思路。胡適後來經常說到，他治水經注案最大關切是治學方法問題，而治學方法在胡適看來實際就是養成一種謹慎戒約自己的良好習慣。這種良好習慣可用四個字來代表：就是「勤、謹、和、緩」。「勤」，就是勤於搜求，眼勤、手勤、腿勤、多得材料，多得證據。「謹」就是謹慎，不輕信，不武斷，反復推求。「和」，就是心平氣和，不假意氣，不動肝火，尤不能動「正誼的火氣」。「緩」，就是不急於下結論。證據不足，把握不到十分，寧可懸而不斷，不可遽下結論。胡適認為，從前的許多學者，對「水經注」的學術公案之所以鑄成冤案，使像戴震這樣一位偉大的學者蒙偷竊趙一清的污名達一百五十餘年，就是因為他們沒有做到「勤、謹、和、緩」。在胡適看來，厘清「水經注」這段公案，關鍵是個校勘學的問題。校勘貴在多得版本。而楊守敬、孟森、王國維等人都沒有在校勘上下夠功夫，他們所見版本太少。許多與本案有關的重要材料，他們沒有看到或沒有認真作比勘。這正如法官斷案，沒有向本案有重大關係的證人取得證詞，只根據原告的片面之詞就給被告定罪一樣。這是「勤」字沒有做夠。他們只注意有利於自己判斷的證據，而忽視一些反面的證據，往往得出錯誤的觀察，錯誤的推論。（例如王國維提出一個通例說：「夫書籍之據他書校改者，苟所據之原書同，則令十百人校之，亦無不同。未足以爲相襲之證據也。至據舊本校改，則非同見此本不能同用此字」。這條通例實際上是不能成立的。既然所據都是同一種書的不同本子，則兩種不同本子或多種不同本子在歷史淵源上很可能有同一的依據，他們字句的相同應屬情理之中的事。何以斷定，所據本子不同，就不可能有相同的校改呢？這正是王國維的不謹慎處。也就是沒有做到一個「謹」字。）胡適指出，楊、孟、王諸人還有一個共同的弱點，就是他們聽信了指控戴震偷竊趙一清的「水經注本」一派人的意見後，便動了「正誼的火氣」，頂起了「正義」的大旗之後，便有了一種感情的沖動，就不容易做到心平氣和，就不容易做到公平斷案。就像一個法官，若對被告產生了正義的沖動，勢必不會注意被告的申訴，勢必會放過許多有利於被告的證據，他的判斷就很難公平了。這就是沒有做到「和」字。楊、孟、王都是在沒有搜求到足夠的證據的情況下過早下結論，認定戴震犯了偷竊罪，就沒有做到「緩」字。

胡適以勤、謹、和、緩自律，搞水經注案二十年，未寫成全案的定稿，似有勤、謹、和、緩有餘，而決斷不足之嫌。但我們翻閱他的考證「水經注案」的稿子，確可以使我們對治學之道有深一步的領悟。

這裡影印的其他考證文稿有些是曾經發表過的，例如，關於曹魏、孫吳「校事」制的文字，《考范曄發表〈神滅論〉在梁天監六年》、《四十自述》的一些章節等等。我們把這部分珍貴的原手稿予以影印，既可保存胡先生的手迹，又可供細心的研究者作文字的比勘。相信讀者不會認為這是多餘的。

這裡收印的一部分哲學史、思想史、文化史方面的稿子會引起讀者極大的興趣。這裡頗多外間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材料。例如《墨經新詁》，過去只發表過一篇《墨子·小取篇》新詁》。這裡影印的是近代史所收藏的《墨經新詁》的全部手稿，共三篇。即《經上》·《經說上》合詁》·《經下》·《經說下》合詁》及《墨子小取篇》新詁》。前兩種稿子，作者自題作於民國五年。當時胡適仍在美國讀書。歸國後，他有重新修訂發表的打算，但只改定了《小取篇》，其餘兩篇未及完成修訂。研究中國古代哲學史的朋友一定非常高興這些手稿的問世。同樣地，論「五行」的一篇長稿（書中編者擬題《五行考》），也一定備受讀者的歡迎。這裡收印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初稿，可供研究者了解胡適對古代哲學史的見解形成的過程，而其《清代思想史草稿》，使我們有機會了解胡適從未發表過的對清代思想的見解。當年根據胡適的提議，北大開設科學方法論的課程，由許多著名學者科學家擔任各門學科方法論的講授。例如任鴻雋講化學方法論、丁文江講地質科學方法論、陶孟和講社會學方法論，汪敬熙講心理學方法論等等。而胡適本人擔任了第一講引論和最後一講（十四講）結論的講授。這裡收錄的這兩部分的講演提綱，可以為研究胡適方法論思想的人補充新的材料。

書中關於西方哲學史、世界文化史的幾種稿子肯定是人們從未見過的。例如西洋哲學史大綱，關於西方思想家的提綱，關於宗教革命的提綱，以及關於古埃及文化史、兩河流域文化史，古印度文化史等。這些遺稿使我們對胡適關於世界古代文化史的思想有了直接的了解。

有關文學和文學史方面的遺稿，也頗有一些極可珍貴的。例如，胡適早年讀書時期所寫的讀書筆記《藏暉室小說新語》、《適庵說詩札記》，以及他陸續寫出的《詩經新解》，後者有一部分曾發表過，其餘都是從未面世的材料。這裡還有一篇未曾發表的小說《我的車和我的車夫》，使我們知道，自己承認「提倡有心，創造無力」的

胡適，畢竟不只寫過收在《文存》一集卷四里的《一個問題》那一篇小說。此外這裏還保存了一些人們不曾見過的胡適的詩作。當年為教學需要所編的《中國文學史選例》，對於了解胡適的文學史見解顯然也有幫助。

胡適的遺稿中，還有一些時論與雜文，講演，及序跋文字，和札記文字。有些雖發表過，而人們很不易見，我們把胡適自己珍藏的剪報或油印活頁本影印出來，一定為讀者所樂見。

胡適的日記，一九八五年中華書局曾出版過排印本，但其中《藏暉室日記》部分有遺漏，（缺宣統二年五月一日至二十一日，即一九一〇年六月七日至廿七日的日記），而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的日記，附錄材料有刪略。臺北遠流出版社於一九九〇年曾影印出版《胡適的日記》十八冊，其中第一至第三冊，即為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的日記，但臺版本系根據美國國會圖書館等處所藏的縮微膠卷影印的，而我們這裏保存的是原本。這次影印可以避免臺版所據膠卷的一些缺陷。此外，胡適遺存的一些記事表，記事錄等等，也都有可補日記的作用，這次亦酌予影印。其中可為我們提供不少研究歷史的重要線索，比如，在一九二〇年的記載人員來往的簿冊中即可查到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五日「毛澤東來談湖南事」一條。對照該年毛澤東七月九日發給胡適的明信片的内容，（見本書第二十四冊）可以看出，毛澤東當年自北京返湖南時，曾把他的想法事前同胡適談過，並征詢過胡適的意見。

二

此書中，最有史料價值的是書信部分，這裏收錄胡適致他人的信和電報，（包括胡適手寫信稿和抄件共三百五十餘通，另有給其家屬的信二百四十餘通），這無疑是了解胡適的思想和生平活動極為珍貴的第一手資料。而書中所收胡適家屬寫給他的信，更有助於增補胡適的傳記材料。尤可注意的，我們從胡適母親和他夫人江冬秀的信里還可以了解一些民間生活、民俗習慣等有趣的史料。胡適的二哥胡紹之有六十餘封信給胡適。此人在胡適的親人中，除了父母之外，是對他有影響的一個人。他頗能讀書，兼有社會閱歷，身歷辛亥前後二十餘年中國社會的劇烈變動。從他的書信中我們看到辛亥革命最初給人們帶來的興奮和隨即產生的失望，很可加深我們對那場革命的了解。

應該特別強調的是，胡適同近千人（實際上與胡適通信的人，遠不止此數。我們這裡選收的約有九百餘人）之間的往來書信的高度史料價值。我們這裡收印他人給胡適的信電共五千四百餘通。這些人幾乎包括了民國時期在各領域、各行業中有重要影響的人物。爲使讀者對此有明確的印象，我順便開列一個名單在下面，是很有必要的。

給胡適寫信或發電的人，有國民黨主要領袖和高級軍政人員如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廖仲愷、孔祥熙、張學良、王世杰、王寵惠、張群、李宗仁、白崇禧、戴季陶、羅文幹、羅家倫、段錫朋、郭泰祺、衛立煌、傅作義、張治中、陳誠、陳布雷、朱家驊、趙恒惕、李品仙、孫連仲等等。共產黨的早期領袖和活動家陳獨秀、李大釗、陳望道、毛澤東、周恩來、惲代英、瞿秋白、趙世炎、吳玉章、鄧穎超、張聞天等等。其他政界名人還有宋慶齡、蔡元培、吳稚暉、梁啟超、馬君武、鄒魯、林長民、范源濂、陸征祥、顧維鈞、易宗夔、蒲殿俊、鄭孝胥、陳炯明、彭一湖、彭學沛、張君勱、張東蓀、曾琦、李璜、陳啓天、章士釗、李石曾、黃炎培、陳叔通、易培基、何思源、張奚若、楊杏佛、許德珩、梁漱溟、羅隆基、杭立武、胡霖、董顯光、吳鼎昌、陶希聖、翁文灝、葉恭綽，以及陳公博、王克敏、高宗武等等。

學界、教育界、文化藝術界給他寫信的更是名流薈萃。如著名學者王國維、章太炎、朱希祖、錢玄同、吳虞、陳大齊、黎錦熙、王照、吳宓、胡元倬、黃文山、傅增湘、袁希濤、沈兼士、梅光迪、楊樹達、楊振聲、湯用彤、林語堂、傅斯年、單不庵、劉半農、劉文典、鄭振鐸、丁福保、丁西林、周予同等等。著名史學家孟森、陳寅恪、陳垣、陳衡哲、顧頡剛、蕭一山、金毓黻、羅爾綱、周谷城、邵循正、姚名達、楊聯陞、鄭天挺、商承祚、于省吾、錢穆、蔣廷黻、雷海宗、吳晗、鄧廣銘、吳相湘、王毓銓等等。著名哲學家熊十力、金岳霖、賀麟、馮友蘭、吳康、朱謙之、鄭昕等等。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高元、羅常培、魏建功、丁聲樹、王力等等。著名教育家張伯苓、邵爽秋、查良釗、陶行知、吳貽芳、郭秉文、馬叙倫、蔣夢麟、陳鶴琴、梅貽琦等等。著名考古及古物學家馬衡、董作賓、李濟、勞幹、裴文中、夏鼐等等。著名經濟及社會學家陶孟和、馬寅初、陳啓修、潘光旦、費孝通、吳文藻、千家駒等等。著名圖書館及目錄學家袁同禮、杜定友、顧廷龍、王重民、嚴文郁、蔣復璁、韓壽萱、裘開明、房北楹等等。著名的新聞界人士和新聞學家狄楚青、邵飄萍、陳博生、張季鸞、徐寶璜、戈公振、鄒韜奮、儲安平等等。著名的出版家張

元濟、陸費逵、高夢旦、汪孟鄒、汪原放、舒新城等等。著名的政治學和法律學家高一涵、張慰慈、錢端升、周鯁生、吳經熊、周炳琳、燕樹棠等等。著名文學家和文學史家魯迅、郭沫若、郁達夫、沈雁冰、謝冰心、俞平伯、汪靜之、康白情、周作人、陳源、田漢、朱自清、胡懷琛、徐志摩、朱湘、蘇雪林、孫伏園、王實味、余上沅、邵洵美、梁實秋、林徽音、凌叔華、陸侃如、馮沅君、孫楷第、郭紹虞、劉大杰、吳世昌、沈從文、蕭乾等等。著名的科學家和技術專家丁文江、任鴻隽、胡先驌、竺可楨、李四光、周仁、秉志、茅以升、汪敬熙、高魯、唐鉞、凌鴻勛、吳健雄、饒毓泰、梁思成、丁緒賢、葉企孫、謝家榮、曾昭倫、過探先、嚴濟慈、錢三強、吳大猷等等。還有著名醫學家鍾惠瀾、施今墨、美術家劉海粟、徐悲鴻、豐子愷、表演藝術家梅蘭芳等等。還有金融界、實業界人士陳光甫、徐新六、鄭鐵如、穆湘玥、沈恩孚、馮耿光、聶其杰、王敬方、李燭塵、社會名流毛彥文、沈崑三、杜月笙、吳弱男、袁昌英、張昭漢、章元善等等。此外，還有著名宗教界領袖于斌、余日章、太虛等。總之，現代中國社會各界有影響的人物，都在此書中留下他們當年的手迹。

這些書信幾乎涉及民國時期思想、政治、外交、教育、學術和藝術等各個領域的重要問題。比如涉及政治問題的，有國民軍驅逐溥儀出宮和善後會議的問題，「五卅」運動和後來的「人權與約法」問題，「九·一八」事變後的對日態度問題，「兩廣事變」及「西安事變」問題，汪偽政權出臺前後的有關情況，以及抗戰時期國民黨高層人士對國內政局的看法，還有抗戰勝利後的國共斗争，學生運動，胡適個人的政治出處問題（他不僅不肯出任政府官職，而且還曾一度想辭去北大校長之職）。這些問題，書信中都有很廣泛很深入的涉及。從中我們還可以看到，胡適怎樣一方面堅決擁護蔣反共，一方面又對遭迫害的青年表示同情，甚至幫助救出某些革命青年，反映了這位反共的自由主義者的特別立場。

胡適同許多職業外交家如顧維鈞、王正廷、施肇基、郭泰祺等皆有私交，同主管過外交工作的汪精衛、羅文幹、王世杰等交誼更深，而胡適又一度擔任駐美大使。所以，他們的書信中涉及外交問題，「五卅」後的中英關係問題，等等。至於「九·一八」事變後談論對日外交方針的書信就更多了。此外通信中還涉及到，胡適出任駐美大使前後一些內幕背景情況。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書信中保存了汪精衛早在一九三三年即敦促胡適出任駐德公使和駐美公使的材料。

這裡收印的大量書信，保存了五·四以來歷次思想文化論爭有關的背景材料和一些鮮為人知的細節。例如，胡適給陳獨秀的信，涉及到研究系人物與胡適等自由派人士間的分歧，丁文江與胡適的通信涉及科學與人生觀論爭中的許多細節。許多青年給胡適的信，反映了他們對白話與古文之爭，以及東西文化之爭的感受。又例如，像錢玄同這樣從舊學營壘中走出來的人，如何關心新文學和新文化的命運，每當舊勢力鼓噪的時候，他怎樣催促胡適出而廓清，以盡其「思想界的醫生」的責任。在三十年代有關「本位文化」的論爭中，「全盤西化」的代表人物陳序經的一封信未發表的信，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了解「全盤西化」論者的思想實質。

書信中有大量關於青年界的材料，例如五·四時期一位青年反映，他們最主要的困惑是（一）家庭問題，家長制的束縛限制了他們自由選擇，自由發展的餘地。（二）讀書問題：守舊家庭多以能識字、記帳為滿足，不肯送子女到新學校里去讀書，怕他們沾染上「非禮」「非孝」的新思想。（三）婚姻問題：絕大部分青年在這個問題上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犧牲者。還有許許多多青年反映他們讀書，求職缺少機會，缺少指導的困難。困惑中的青年在各種刺激之下往往走上激烈反抗的道路。胡適在給家鄉朋友的信中曾寫到，由於某些教育界守舊勢力的倒行逆施，正幫助造成許多「陳獨秀的信徒」。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青年有他們新的問題，而這些問題，終於推動其中許多人走上抗日或革命的道路。

我們在本書中還可以看到學生們如何反對考試，如何為升學而造假文憑，甚至還有個別學生因假文憑被發現而不幸自殺的材料。這些材料，治中國現代教育史的人都不應該忽視。王敬方的一封信記述中國公學早年歷史的長信，同樣有供教育史家參考的價值。

我們還可以看到五·四以後，爭取婦女解放運動中出現的一些頗有社會意義的材料，例如一個大家閨秀如何受無政府主義思潮的震動，而離家出走，參加工學團的活動，一個被逼嫁人的女子如何勇敢地逃出家鄉，只身跑到北京求學，等等。

書信中有許多材料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一些報刊如何創辦，它的輿論趨向如何，及其經營活動的特點等等，可為新聞史研究的重要參考。

還有大量關於某些學術機關和社會團體的產生、活動情況等方面的材料。例如胡適本人參與創辦的一些

社團的活動情況，又如著名的中央研究院的產生、發展，院長的補選，及第一次院士選舉的有關細節等等。特別應該提到，在民國時期，尤其在抗戰前，對我國教育文化和科學研究事業有重要關係的，管理美國退還庚款的機構——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它的產生、組織沿革和有關活動等等，書信中保存了很重要的史料。

作爲一個有重大成就和影響的學者，在胡適所保存的書信中，直接關係到現代學術史的材料尤爲豐富。治學術史的學者將在這里發現一個真正巨大的寶藏。在這里可以見到文學革命從蘊釀期到發動期，到推向全國整個過程中許多人所未見的珍貴史料，可以見到《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冊）出版，給中國新學界所帶來的刺激，可以見到由《水滸傳考證》和《紅樓夢考證》所帶動起來的古小說研究的熱流和整理國故的逐步推展，以及古史討論，古史辨派的形成等重要學術史上的大事。這里還可以見到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推動中國學術進步的那一群學者間的友誼和互相切磋的情形，可以了解到學術界某些重要新問題提出的緣起，和某些重要古籍和史料的發現所引起的學者們的興奮。

應該特別指出，胡適有些政界、教育界、學術界的朋友，同他經常保持密切的書信聯系。本書收錄其書信在二十通以上者有四十八人，三十通以上者有三十二人，五十通以上者有十二人，一百通以上者有三人，在這些人中包括丁文江、王重民、王雲五、朱經農、朱家驊、任鴻雋、沈從文、汪孟鄒、林語堂、周作人、胡近仁、高一涵、高夢旦、徐志摩、翁文灝、孫楷第、梅光迪、張元濟、張慰慈、陸侃如、陳垣、陳源、陳獨秀、陳衡哲、陶孟和、陶行知、傅斯年、楊杏佛、楊聯陞、趙元任、蔡元培、蔣夢麟、劉文典、錢玄同、羅常培、顧頡剛等等。他們的書信廣泛涉及思想、社會、人生、學術、公務與私誼等等問題，提供了極爲豐富的傳記史料。可以毫不誇張的說，細心閱讀這些書信，再廣泛查閱資料，在《胡適與某某》的題目下，可以寫成數十本有價值的傳記著作。

總之，一切治中國現代史——無論是現代通史，還是專業學科史——的學者，都可以在本書中找到極有價值的材料。這本書的出版，應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一件可慶幸的事。

三

這本書對全面而深入的認識胡適本人，自然具有更爲直接，更爲重要的價值。任何個人都是生活在特定

的社會關係中，包括家庭、親戚、朋友、同事，以及因種種事件，種種因緣而發生各種關聯的人物等等。每個人都生活在由上述種種人物而結成的人際關係之中。一個人的性情與修養，才華與事業，都是通過上述諸種人際關係而展現出來的。這本書以其豐富的史料爲我們提供了胡適社會關係的全景畫面。認真研究這些材料，一定可以幫助我們對胡適有更爲全面而真切的認識，廓清某些片面和不實之論。

例如，魯迅先生曾把胡適與陳獨秀來作比較，說陳獨秀的爲人，好象他的門上明貼着招牌：內有武器，須小心。而實際上並沒有什麼，胡適呢？招牌上寫着：內無武器，盡可放心。而實際上，頗須小心，里面可能有些什麼（大意如此），魯迅的意思很明白，胡適不是個坦蕩的以誠待人的人。我研究胡適近二十年了，他寫的東西，無論已刊、未刊，可以說，大部分我都看過，也看過不少別人所寫關於他的文字。我總得不出和魯迅相同的印象。當然，胡適交際廣泛，是個深通世故的人。但他的通世故，不過是總力求理解人家，并無以權術害人之意。他若不能以誠待人，絕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朋友，他若不能以誠待朋友，絕不可能同那樣多的不同年齡，不同職業，不同地位的人保持終生的友誼。胡適常自律：「做學問要於不疑處有疑，待人要於有疑處不疑」。所謂「於有疑處不疑」，即不誣枉人，不作誅心之論，并非不分是非善惡。相反，朋友有過，他總是毫無矯飾，直言相諫。例如，他對劉文典就曾尖銳地批評他不該「以書賈待人，而以市僧自待」。這封信，就收在本書中，讀者可以覆按。

總之，若撇開思想信仰、政治主張不論，做爲一個血肉性情的人來看，胡適應該可以說是一個胸懷坦蕩，鞠誠待朋友的人。

又例如，「九·一八」事變後，胡適長期持低調立場，不主張對日作戰，謀求交涉，寄望國際輿論。這在當時無疑是很不合時宜的。對他的主張，人們盡可以批評，但由此而論定爲「賣國」，則顯屬誅心之論。實際上，胡適的主張，不過是一部分知識分子，憑他們的知識和理性，針對面臨的形勢而提出的一種選擇。他們自認爲這種選擇，對國家比較利多害少。這是一個選擇正確與否的問題，不是是否愛國的問題。我們看一九三五年華北形勢最危急的時候，王世杰、傅斯年等給胡適的信，可以明白，胡適等一群教育界領袖是如何以中流自任，反對華北特殊化，堅持在危城中繼續履行自己教育家的責任。從而可以知道，他們的愛國之心，與別人的並沒有什

么不同，不同的只是觀察的方法和選擇的途徑而已。當全國抗戰爆發後，他破例地出任駐美大使。在當時，他認為這是戰時應國家之召，盡一個公民應盡的有如兵役或差徭之類的義務。所以盡心盡力，除了日常外交工作之外，他時常連綿奔走幾萬公里，在幾十處地方，做上百次講演，以喚起美國人對中國抗戰的同情心，打破美國政界的孤立主義和重歐輕亞的觀念，支持中國抗戰。這些，在他給朋友和家屬的信中都有充分的反映。他在給夫人江冬秀的信中曾說：「我是爲國家的事來的，吃點苦不要緊，我屢次對你說過：『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國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們的子子孫孫都得做奴隸」。（見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胡適給江冬秀的信）。我認為，把這樣一個人說成是一個賣國主義者，實在是莫大的冤枉。

還有一個流傳很廣的說法，即認為胡適是個「全盤西化論」者，甚至還有更難聽的說法，如什麼「買辦文人」，「崇洋媚外」，等等。看看本書所收的胡適與他的家人、朋友間的通信，可以知道，胡適一生最重要的時期，從一九一七年留學回國，到一九四八年離開北平，前後三十餘年的時間里，他始終關注的是中國傳統文化如何同現代化相銜接。也就是如何推陳出新，創造中國的新文化的問題。自然，他心目中的現代化和與之相適應的新文化，只能是以西方發達國家的模式爲借鑒。而西方發達國家，差不多都有侵略中國，壓迫中國人民的歷史和劣迹。一般中國人，對他們的東西有相當的反感，這是非常可以理解的。胡適動輒引證西方的模式來批評中國的舊傳統，這是他背上「買辦文人」，「崇洋媚外」，和「全盤西化」的罪名的基本原因。

但如果我們不單從形式上看問題，而是透過形式看實質，對具體問題作具體分析，那麼，我們就可以得出比較更切合實際，更公允的結論。

在胡適全部著述中，介紹外國思想的文字甚爲有限。而在這有限的介紹文字中，人們只要細心閱看，應可發現，他的介紹不是照抄，照搬，而是相當中國化的闡釋。本書中收入的《杜威的「正統哲學觀念」與中國哲學史》（編者擬題），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裡，我要稍微提一下前些年我同吳森博士的一點爭論。吳博士太強調了胡適對杜威思想的「中國化」，認為他是打着杜威的招牌，販賣自己的私貨，認為他的思想與杜威思想完全是兩回事。我則認為，在實驗主義一些最根本的觀念上，兩人是一致的。只是胡適介紹杜威的實驗主義時加上了「中國化」的闡釋功夫。有沒有這層「中國化」的闡釋功夫是大不一樣的。只有對中國傳統有相當領悟的

人，才能做到這一點。

胡適一生著述，絕大多數都可看作是對中國傳統的重新闡釋，也就是他所說的「整理國故」。我約略估計一下，胡適一生著述二千餘萬字中，至少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直接以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典籍，和思想、人物為研究對象的。這其中固然有不少是做批判的、破壞的功夫。但同樣也有不少是正面予以闡釋，做推陳出新的功夫的。像《先秦名學史》、《中國哲學史大綱》、《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白話文學史》，以及關於老子、孔子、墨子、王充、李贄、朱熹、顧炎武、顏元、程廷祚等思想家的許多獨立的研究文字，還有關於王莽、王安石等歷代改革家的論述，以及大批的古小說考證文字等等，都是這方面很有影響的著作。這些足以表明，在胡適看來，中國傳統中也頗不乏積極的，至今仍保存其價值的東西。本書所收的胡適遺稿，也可證明這一點。而他同學界朋友的往來書信有相當多的部分涉及傳統學術遺產的內容。他覺得罕見的珍本的快樂，他對某些古人的「奇見」的賞識，他與朋友討論這些相關問題的執着，他對前輩整理國故中有新創見時，由認同感而引起的興奮……這一切，在本書所收的大量書信中都留有記錄。而這些，同樣可以證明，他決不是像某些人所說的「全盤反傳統」，「全盤西化」的一個人。

我不否認，胡適有激烈攻擊中國舊傳統的言論。其中有些言論是人們難以接受的。但如果了解發表這類言論的背景，了解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上不同思想流派激烈論爭的情況，我們就可以知道，胡適那些過當的言論都是有所激而發。當他的對手們認為「西化」就是「蠻夷化」。認為中國「自古就是用美德鑄成的黃金世界」的時候。胡適的過激言詞就可以理解了。

大凡在爭論中，雙方各自要強調自己看重的那一面道理，而批駁對方，往往都會發生過當的言論。如果不顧及爭論一方對有關問題的正面闡述，而只把爭論中的過當言論孤立地提取出來，一定會得出片面的結論。本書中所收的大量書信，極有助於我們了解民國時期思想文化論爭的背景。因而也有助於進一步了解胡適的思想實質。

還有一點特別值得注意，即胡適同中國許多老輩學者的深摯友誼。這些老輩學者都受過很完全的傳統教育，有深厚的國學修養和很篤實的傳統道德觀念，例如蔡元培、梁啟超、張元濟、高夢旦、汪孟鄒、乃至傅增湘、